

使命 责任 人生 已 成 生

Universiteit Leiden



2 938 281 4

SINOL

UNPO

207

18 2008



打工诗人

杨牧题

2001年5月31日创刊

中国·南方

《打工诗人》

打工诗人编委会 主办

总第18期（内部交流）

本报编委：许强 徐非 罗德远 任朋友 张守刚

许岚 王甲有 黄吉文 李明亮 张绍民 李笙歌

全国各地联络点（特约编委）：陈忠村 汪洋 程鹏 张五扬 黄荣东 刘跃松 李福登 张国良 王晓忠 郑建伟 王辉 韩文建 雷元胜 知闲 倪言 唐以洪 周大强 唐诗 张东吾 封志良 白治兴 刘小雨 邢建军 冷峻 王新荣 冬子 蔡佐军 陈三界（欢迎没建立的省市继续申请，共同完成我们打工人的事业）

刊名题词：杨牧

理论顾问：张德明 柳冬妩

打工诗人QQ群：61128734（已满） 打工诗人2群：65482321（申请这个）

本报网址：<http://tw.netsh.com/eden/bbs/710205/>

中国打工诗歌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dgsr>

出版日期：2008.11.30

中国

广州

投稿邮箱：dgsr@263.net

拯救诗人白连春

（泸州晚报记者 初旭/文）
绵绵的秋雨，淋湿了街道和街道两旁的小叶榕，也淋湿了人们阳光的思绪。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某住院病房里，一位清瘦的中年男人正躺在病床上，看着输液器里那晶亮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这位男士便是《北京文学》杂志编辑、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泸州籍苦瓜诗人白连春。时下，身患重症的他，回到家乡泸州治病，希望有更多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用一片爱心拯救我们的作家诗人。



（病床上的白连春）

半本“泰戈尔”与缪斯结缘

今年43岁的白连春，1965年农历正月出生于我市茜草街道办（原沙湾公社联合大队），其后几年，二弟、三弟、四弟也相继诞生在这个贫寒的农村家庭。连春六岁上小学那年，父母决定送他到祖母家长期生活。祖母家住同村的飞仙台屋基，隔连春的家有二三里路远，要走过几个小山头。由于在江对岸泸州城里工作的祖父还没有退休，年届花甲的祖母生活上需要有人陪伴和照应，于是让长孙连春去了祖母家。白连春从此就离开了父母，由隔代老人抚养，这是生活的选择，是长辈的决定。也许是环境的改变，也许是自感被父母“遗弃”而寄人篱下的悲苦，生命的底色里没有艳丽烂漫的春天，白连春的童年便烙下了沉默寡言、不合群的性格阴影。

从小和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学会了打柴、割草和栽秧除草，孩提时代的某一天，他在垃圾堆里捡到半本泰戈尔的《飞鸟集》，从此与缪斯结缘，爱上了融入生命的文学。高中毕业以后，便走进军营，来到了地处祖国北端的黑龙江，那肥沃的黑土地、茫茫的白桦林、一望无际的北大荒，这里的一切给白连春以灵感，1985年秋天，他饱蘸激情写下了《我迷恋的北方》，并在同年10月的《诗林》发表，成为他的处女作。随后他退伍回到家乡泸州，他农忙种地，农闲外出务工，业余时间，读书和诗歌陪伴他度过许许多多日出与黄昏。

上世纪80年代末，诗歌的种子在白连春的心里生根发芽，继而迎着春天的脚步开始疯长，他节衣缩食，先后参加了《诗刊》刊授学习，身上没有一分钱，他就冒险爬火车赶到刊授学院在青

岛举办的学院创作座谈会。事后，谈起那次经历，他自己也为此捏了一把汗。1990年4月，白连春用农民的质朴、诗人的激情在《人民文学》推出了《一个农民写他自己的庄稼》（组诗9首），同年他的《咸菜》（外1首）斩获首届《四川日报》文学奖，从此，奠定了他在四川文学的诗歌地位。他是一位勤奋的诗人，自上世纪90年代就是《诗刊》的重要作者了。1997年《星星诗刊》组织全国读者投票选出最好的诗歌，白连春夺得了第一名，90年代末，他的第一本诗集《逆光劳作》入选了“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得到了许多文学界专家的认可，诗歌评论家海城、邹建军、吴思敬等纷纷为他撰写评论文章，为这位来自泸州农村的农民诗人“雄起。”

1999年，白连春觉得诗歌表现力相对较小，转向小说创作，在河北农村写下了第一部短篇小说《身体里的感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成为他创作小说的开端。随后，他在没有放弃诗歌的创

作的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先后推出了《北京》、《母亲万岁》、《火焰》、《背叛》、《雪地上的灵魂》、《天亮出发》、《祖国的心脏》、《水中央》、《太阳活着》、《四川姑娘》等中篇小说二十多部，特别是他在2000年9月《人民文学》推出的中篇小说《拯救父亲》，先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并获得著名的老舍文学提名奖，也因自己的一首《苦瓜》诗歌和自己上千首的庄稼诗歌，被人们誉为苦瓜诗人。

北漂的日子一个人穿越

白连春是一位为诗歌而生的人，也是一位执著而坎坷的诗人。在他心中，文学最重，那年他从南下务工回来，被泸州市文联招聘，成为龙眼树诗歌培训班的教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一起沐浴在文学的朝晖里……一次，听说鲁迅文学院组织诗

会，他就揣上微薄的路费，来到北京，诗会结束后他没钱回老家，就在鲁院的食堂打工，给人包水饺，做饺子皮。他就这样一边打工，一边凑了些散碎的银两毫不吝啬地投资文学，用于购书和阅读，后来的后来，他在当地政府的关爱下，被招聘为江阳区文化专职干部，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1997年，这个因文学获得重生，在文学里站立的青年，终于又放弃所有现成的物质条件，放逐自己，背负行囊，奔向京城，踏上漫漫的文学流浪和朝圣之旅。“京城米贵，久居何易？”无奈他跑到河南打工，卖凉席。他一边打工，一边搜集当地的民歌，跟普通的百姓接触，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在他那些四处流浪打工的日子里，靠咯血的诗文保持着他内心的秩序和尊严。正如易中天所说，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时间长了，总被人看出来，白连春就是这样，凭藉自己出众的文学才华，成为《北京文学》的编辑，而后成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开始到北京务工的一段时间，工资只有八百多元，他就鼓励自己坚持下来。后来工资涨到三千元左右一个月，他想到自己也不可能长期租住在地下室里，就通过银行按揭买了一套38.8平方米的住房。时下的白连春仍然很穷。没有钱，没有职称，只有一支笔，一张纸。祖父母去世后，他很少回家，回家的路费对他而言都是高昂的消费。每月收入除了供给自己的生活必须，他还得还2000多元的月供房贷，给家乡老父母寄点养老费。白连春是一个实在的穷文人，是一个穷得赤裸灵魂用良心滋养和说话的文人。功利时代，在价值取向日益混乱，生活的无序和对物质的过分沉溺，人们失去了应有的方向。这期间，有多少文人变节，向钱权声色躬身屈背？有多少知识分子失落了道义和良心？而他依然故我，怀揣赤心的火焰，背着一个破旧的牛仔包，骑着永久自行车，昂然穿行在繁华京城的市井欲流里。

美好的生命我不想离开

今年9月，北京的冬季来得特别早。白连春突然感冒，他就随便到街边的药店买点感冒药吃，很长时间也不见病情好转，花了八百多元到

医院检查，也是同样的诊断鉴定——感冒。后来感到病越来越严重，而且肚子上还长出一个包，不得已，自己抽出时间，把编辑部10——12月的工作做完，又把2009年1——3月份的重点工作做完，才拖着病体回到泸州。他没有更多的积蓄，在朋友们的帮助下，3天前住进了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短短的3天时间就花去了近万元。

初步检查，被医院诊断为肺结核、淋巴结核、前列腺炎，目前还没有最后确诊。据白连春自己介绍，有可能是癌症。闻听泸州的诗人患病住院了，很多白连春的亲人和朋友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江阳区文化馆捐款1000元，江阳区文体局捐款500元，泸州法律界人士白联洲代表白氏家族捐款5000元，泸州小说作家曾平捐款1000元，诗人梁晓霞、蒋晓灵等也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白连春的诗歌是孤独的，人也是孤独的。他多次与爱情擦肩而过，奶奶去世后，就一个人生活。昨日，记者走进他的病房，看见其他的病床前都有妻子、老人或孩子陪伴的身影，唯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床边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和一个有些发白的牛仔包成为他带回泸州的全部家当，床头柜上那两只米把早已被寒风吹凉……他躺在病床上，一边等待护士输液，一边细心地回忆好心人的捐款，并一一记录在身边的一个小本上。采访还没有结束，他就催促记者离开，记者有些不解，他说：老弟啊，你还年轻，还有家小，没有更多的事情，最好早点离开，这里是传染病病房啊！他这一说，让记者也眼泪汪汪，多好的诗人，多好的朋友啊！面对重病，白连春告诉我：我不想这样年轻就死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

朋友，当你幸福地和家人团聚，当你怡然看长江潮涌，当你静心地品茶品诗，可曾想到我们的诗人还在病床上遭遇病魔折腾……为了拯救诗歌、拯救泸州诗人，请你伸出援助之手。泸州晚报爱心热线：0830-3190929 13882779006 各位朋友若有爱心，可汇款支持。

（开户名：白连春 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6222032304000952111）

白连春：我无法选择

父母把我生在农村，这是我无法选择的。我家很穷，供不起我上学，所以我高中没毕业，这也是我无法选择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现在，暂居在北京，这还是我无法选择的。为了释放身体和心灵的苦难，也为了让自己不绝望，不怨恨，不逃避，不背叛，我爱上了文学，这，更是我无法选择的。以前，我叫我农民诗人，现在，你叫我打工诗人，有一些歧视，有一些同情，还有一些理解，这，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但同样也是我无法选择的。

在你没有叫我农民诗人时，我就写了很多乡土诗：1990年4月《人民文学》发表我的组诗9首《一个农民写他自己的庄稼》。1997年11月《星星》诗刊发表我的组诗8首《逆光劳作》（获跨世纪诗歌奖第一名）。我写庄稼。我写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的忧伤和梦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农民的劳动。我还写农村的景致。但是，我一直没有加入“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在你没有叫我打工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农民在城市求生存的诗：1991年9月《诗刊》发表我的组诗6首《城市缝隙里的乡土》（获当年《诗刊》优秀作品三等奖）。我写露宿街头的农民。我写当建筑工人的农民。我写卖菜的妇女。我写捡垃圾的老人。我写乞讨的孩子。然而，我不是“打工诗人”组织的成员。写了二十多年的诗了，也发表了二十多年的作品了，我不是“第三条道路”，不是“中间带”，不是“垃圾派”，不是“口语派”，不是“下半身”，当然，也不是“学院派”。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我自己：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

我在北京打工，在某杂志社做编辑，过着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生活：上班，默默地看稿子，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给作者写信，打电话，为别人写的好作品激动，我喜爱那些来自底

层的作者的作品；下班回到家里，默默地写自己的诗。和社会上的人，我格格不入，从不交往；与热闹喧嚣的诗坛：无论什么派，什么圈子，都不相往来。我在北京打工，有一次，单位给我发的工资里有50块钱是假的，我找了财务，财务不承认，更不认，我气了半天，想拿去花掉，又想，算了，我不能去害人。我就把假钱留着，当作纪念。一个人的生，有一张假钱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我在北京打工，户籍和工作关系都还在四川，北京不给我上养老和医疗保险，在四川也无法上，就一直拖着。以前，我身体好，现在，我有了病了，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夜里多次起床，睡不好觉，是因为总骑自行车和总坐着的缘故。我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太远，在北京郊区，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往返三个小时。为什么我要骑自行车上班？一我晕车，二坐车上上班必须换两次车，车费太贵。为什么我要住在郊区，因为城里的房子太贵。我有了病了，不敢去医院，北京的医院是虎口，只好在药店胡乱买点药吃。我在北京打工，做最多的活，拿最少的工资，每年，还要给在四川老家的父亲和母亲寄1200块钱，今年年底就寄明年的钱。因为太穷，我至今没有结婚。有一个女朋友，认识几年了，说，对我的爱还不到结婚的程度。

从1999年开始，我发表小说了。第一篇《身体里的感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第二篇《拯救父亲》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一时间，《当代》《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江南》《山花》《草原》等杂志都发表了我的小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都转载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大多是中篇，内容大多是写农村艰苦，农民来到城市求生存也不容易的。

我写了一个东西，放一段时间，改几次，觉得满意了，又放一段时间，又改几次，又觉得满意了，左看右看，觉得真的不错，就投出去，然后，就不管了，如果发表了，有了稿费，就收着，如果没有发表，就算了。我就是这样生活着。我写的东西既不传统，也不现代，也没有什么技巧。原始地。主动地。承担地。潜意识地。直接来源于我的内心深处。对于你也许，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写我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争什么话语权。我什么权都不要。我甚至连人生最起码的医疗和养老的保险都没有上。我只要活着，且写着。对于我，这就够了。我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名字注定要被遗忘，一个身体死了后注定要腐烂的人。活着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爱着，忍受着，写着，为了报答当初父母生下我，祖父祖母又含辛茹苦地把养大，为了对得起将来的死亡。

世界博大，生活辽阔。作为打工者的我，人生却越来越逼仄和孤独。在北京，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我是北京人。在北京，我想四川。在四川，我想北京。然而，北京和四川都不承认我。我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四川人。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失去了故乡。我这一生一直在失去。我失去的远远不止土地，家和故乡。我还失去了青春，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理想，总有一天，我还会失去生命，但是，现在，我还苦苦地挣扎着，努力着。

我一天比一天衰老多病，经历一天比一天丰富，欲望一天比一天少，作品也一天比一天写得更有经验，更多生命的烙印。为了报答在我人生的路上给过我关爱和帮助的人：父老乡亲，老师，编辑和朋友，还有那些知道我的名字的人，我认识的人，我见过的人，我要努力活着，活得更好，同时也努力写得更好。

我是小的，善的，真诚的，没有危险的。我的生命，包括我的诗歌和小说。活着，我是一只蚂蚁，一棵草，死了，我是一粒尘埃。

我无法选择。

白连春的诗

在庄稼地里松土时我发现一小节骨头

突然我觉得我的心在接近一颗久远年代的灵魂这颗灵魂的拥有者已成为我脚下的泥土。我看见他从时间的那一头朝我走过来。我扶住锄我扶不稳身体。我的身体摇晃得厉害我感到我和他是同一个人：他喘息的声音以及阳光下他额上闪烁的汗水和我一模一样

而且我们始终在走着同一条路，就是最后成为泥土的路。我相信几十年以后同样会有一个和我一样松土的人，在庄稼地里发现我的一小节骨头。我轻轻地起那一小节骨头，感到手被烫了一下：似乎还有血在燃烧……一大片庄稼地迅速朝我涌过来。我立刻被淹没了。

黄牛

收起被风撕烂的帆和扯断的缆绳
停在农民手中 农民的妻子和睡眼的母亲
以及还未出世的女儿都在精心地
缝补黄牛的伤 它的旄杆仍是笔直
骨头露出雪白的 在石头上航行了
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
黄牛的伤比去年更像它脚下的波涛
离阳光和天堂的门越来越近 停在
冬天的港口 农民温暖的干草使泥土上
这条河流一直向东 一直在
黄牛的背上走 黄牛一边吃着干草
一边喝着泥水 在这个荒凉的傍晚
云贵高原上的风正猛烈地撕扯着
黄牛知道在云贵高原上
风只有在它的背上撕扯的时候

才叫风 而农民只有在它的后面 把它当船拉的时候叫农民

挖苕：在秋风落日的苍茫中

我得挺住。尤其在儿子面前，尤其在秋风中虽然怀着落日时苍茫的感情还得把锄一次又一次举过头顶，还得把腰伸直。我是儿子的榜样我要他知道，日子很艰辛，但是还可以活下去，而且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像君不仅要争一个圆还要献出自己的甜。摸着儿子小小的扁扁的头我的心像一颗埋在苦难深处的芽：挣扎着……需要力的支援。天马上就要黑了，冬季马上就要来了，而儿子从锄把上跌下来的姿势，摔得我好痛

用尽一生努力抵藕的人掘出自己的心

一双关节粗大筋骨裸露的手已不是在抵藕，是在哭泣！是在为世界难过！抵藕的人在最低的地方俯视这个现实社会：就是白和美越来越少了

抵藕的人在最脏的地方，在最冷的地方在天暗下来的时候，特别是在心不值钱的时候把心抠出来。用尽整整一生的努力

在无边的黑中和白中抵藕的人弯曲他的躯体在一块冬季的田里。就像此刻的这个夜晚你把你的躯体弯曲在一张稿纸上

抵藕的人和你别无选择的合而为一。面对苍凉的时间和漫长的流逝过程

每爬一层，那阴影就大一点（组诗）

□孙海涛

打磨

打磨一个零件的毛坯
它灰暗、粗糙，宛如天空覆盖着的
阴郁。打磨子夜的天空
月亮跳出云层。月亮
必须是你所期待的月亮
浑圆，皎洁。必须是故乡屋檐上
曾经悬挂过的那一轮
打磨一些铁锈，这岁月的皱纹
足以让最坚硬的铁
满面沧桑。一些光被还原
还有一些，藏在心里
萌发一段青涩的爱情。你开始打磨自己
胡须以及悄然茂盛的青春痘
花费掉十分钟，三十元的娜拉娜
直到小圆镜里露出
满意的微笑
打磨夜晚余下的时光
时光在河流里沉淀，在青草的岸边蓬勃
月亮落下西山，还不见我的情人
哦，今夜就让我孤独到底
今夜，就打磨这孤独
白色蝴蝶敲打窗棂
蓝色的鸟儿在天空扑棱棱飞

光

那是光，从南面窗口射进来
车间拥挤着
赶货的工人，偶尔抬起头

在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瞬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我的身体涌起莫名的悲伤

一那是光，来自你们的眼睛
一盏盏昏黄的灯
是隐忍的泪
是深渊

我习惯了他们

——给一对以拾掇破烂为生的老人

我习惯了他们……

我习惯了他们站在篮球场边等
十分钟。就为一个矿泉水瓶子张大油黄的瞳孔

我习惯了他们徘徊在低处的身影
臭水沟，围墙下，街头巷尾，垃圾堆的角落落
落……
从清晨到夜晚，从喧哗到寂静

我习惯了他们弯腰时的沉重
就像他们自己习惯了这艰难
两双松树皮一样的手
反复弯腰反复把手伸进垃圾

我习惯了他们身上的气味
老远就能闻见，刺鼻的异味扑面而来
也有清爽的时候。当他们傍晚归来
坐在树下抽早烟、喝米酒，方言中打开如水的月色
我仿佛听见了乡村的寂静和双亲劳作归来时舒心的笑

我习惯了他们星月下露天的睡眠
在高科技厂大门边的荔枝树下
一块破旧的木板是他们的床，麻布袋是枕头
垂落的茂密的叶子宛如蚊帐
每次经过这里，我总能听见细微而均匀的鼾声
他们竟像睡在花园洋房里一样安静和酣畅
真的，除了安静我没有听到别的

我习惯了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平静
当他们背着蛇皮袋拿着铁钩
沉默地走在工业区的霓虹灯下
绕过繁华的街道和拥挤的人流
一道道鄙视的目光射过来

保安冷漠的手势、驱赶的声音
他们，丝毫也没有自卑与慌乱

我习惯了他们
习惯了每天与他们的会面
习惯了他们看到我时惯有的微笑与慈祥
这漂泊的日子，人情冷漠的异乡
有时，我忍不住想叫他们一声：爹、娘！

铁

铁在嚎叫，让我在漫长的黑夜里感受到内心的
重，让我负重前行。
——郑小琼散文《铁》

阳光倾斜着照进车间
铁屑飞扬
尖利的轰鸣将持续一整天

铁在缓慢前进，车刀张开锋利的巨齿
宛如撕开一段沉寂的日子
我看见它灰黑色的表面下
银白的光泽崩裂而出
——这属于铁质的光芒和声音
时时刺入眼球、击打内心

滚烫的炉火以及350KW功率的电机
周而复始。铁让时间升温
汗液像泉水一样涌出
流经额头、眼睛、脸庞、胸口
可是我已经麻木。一如被操作了命运的铁
切割、锻打、弯曲或者扭直
它不懂得什么是疼痛
也不懂得什么是幸福

哧哧 的火花在凌晨渐次熄灭
又一个日子被打磨、锻造
骤然沉寂的车间和渐渐冷却的铁
当我离开，当我在梦中醒来
我常常感到莫名的忧伤

我仿佛听到铁在尖叫声中徐徐前进
也仿佛看到那些遗落在车间角落里的
锈迹斑斑的铁

那些孤独

那些苦难与沉重生活背面的光芒

铁，在嚎叫
铁，在歌唱

伤口

时间，会磨平这些伤痛
——郑小琼《时间》

要珍惜每一次疼痛。要记住
铁在少年手上戳开的花朵
它们鲜艳，在灰尘和黑铁屑弥漫的车间
多么可贵

这是机器与肉体的又一次对话
骤然的尖叫，长久的失语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机器木然地站在一边
血，沿着少年的手，一滴接着一滴

伤口还在化脓。在午夜
一个人的宿舍多么寂静
纱布、酒精、云南白药以及
遍地的月光
疗伤的药剂一一列开
可是我该如何选择？
少年时常想起故乡
少年在人情冷漠的南方独自穿梭、挣扎

——受伤的手终究会慢慢愈合
漂泊的日子，那无处不在的伤痕却足以
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它们或灰暗、微小
它们或浅薄、深刻
谁在说：它们留给身体的不只是疼痛和烙印

时间悄然流逝，少年慢慢长大

阴影

一个讨薪的民工
在人民南路路边的铁塔上爬着
他的头顶还有一只鹰在盘旋
它的阴影首先笼罩住一个人
接着是一行人、一群人……

他说他要爬到最高的地方
然后，跳下来

每爬一层，那阴影就大一点
每爬一层，那阴影就大一点

风吹动

风吹动。路边低鸣的落叶
风吹出故乡阴郁的秋天
屋檐下摇晃的红玉米
风吹出诗人的乡愁

风吹动翅膀
风，把眼泪吹向高处
母亲转过身去。一低头
就看见她飘动的衣衫

风吹动。风吹响鞋子与路面的摩擦
风吹出深处的渴望
一座远方陌生的城
那是我抵达的地方

风吹动异乡河流的波浪
风，把船帆吹得越来越亮
一个声音在心里回荡：
风，请你吹过老娘的窗前
请吹出我苗壮的身影

风吹动……

让刀子说（组诗）

□梁彦选

一位朋友

记得去年腊月
我们围坐在煤炉旁
畅谈人生
窗外白雪
你说我们要做炉火
给寒冷的世界加火
而今你却用一件皮衣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老板的话

死一个人算什么
老子有的是钱
多少工友在不明不白中
死于这样的狂言

小桥

你弯曲的脊背
承受了多少屈辱
那潺潺的流水
可是你漫长的哀怨

看不见的手

五十年前
你的爷爷死于冒顶
五十年后
你的父亲死于透水
今天
你望着可怕的黑井口
向后退
却被一只用力往下推……

挖煤工

你们要去的地方有多深
在地狱下面

那里可有
明媚的阳光 清新的空气

在那里
昏暗的灯光照不破四周的黑暗
飞扬的煤尘直往鼻孔里钻
弯着腰就能碰着头顶的天
断柱的响声把心提到了
嗓子眼儿
脚下的积水像无底的深渊
荡漾着恐惧和不安
闷热脱去了全身的衣服
黑黝黝的身子像海豚在汗水里钻
工头的骂声不绝于耳
矿工的心头啊 像海浪在滚翻

是贫穷硬是把我们逼到了
这下面
不是为了家里的几张嘴
孙子才会给他们卖命干

让刀子说

包工头
欠我们的工钱什么时候给
说烂了舌头 跑折了腿
你们总是说 明天 等一会
别把我们当猴子耍呀
惹急了 就让刀子去说理

命令

中央三令五申
无证小煤矿一律关停
地方传来密令 不要怕
我们会闭上一双眼睛
承包人心领神会
于是糖衣炮弹打退了
检查团一次次进驻
天轮依旧不停地转动
工友遇难的消息
不断地涌现在地球的深处……

麦子熟了

五月的麦子
土地被滚滚的麦浪淹没
农民忙着收割金色的浪波
五月
天空是热的
土地也很热
最热的是烫伤心灵的麦子
在这增产不增收的年月里
农民热得透不过气来

下岗的作家

当太阳爬上楼顶
一群“作家”来到大街上
靠墙根把自己的“作品”一字排开
衣服鞋帽是小说
玉器饰品是散文
针头线脑是诗歌
每一部作品都写着相似的内容——
苦难的生活 悲惨的遭遇
一家人的希望寄托在上面
如谁的作品受到了青睐
准能得到同伴地喝彩

来来往往的行人啊
当你走过他们的身边
别忘了捎上一本
那曲折的情节准能打动你的心

跌倒

深夜。11点。一个工地上的小工
失足跌倒在记忆里。浅的坑道
不足半米的高度 他毫发无损
明白真相的切割机此时一声不吭
他爬起 楞在那儿象一根冰棍
50CM左右的地方
一根近50CM的钢筋 如一根
刺。他脑子一片空白
暗淡的灯光在地面铺陈了一层薄霜

这是1994年。广州夏茅。省邮电工地
掉进坑道的小工是我。一根短短的
钢筋，深深插在了我的打工岁月里

事件

放下手中的瓦刀
沿着防护栏的竹篱从三楼滑下来

在一首诗中邂逅深圳

走在深圳的大街上
和亲手搭建的楼群对话
青春如一本书
有人草草翻过
有人细细阅读

徘徊在立交桥的夹缝之中
单调的工衣
裹不住彩色的梦想
人生是一张未标注的版图
它一次只展现其中一刻的辉煌

一块破木板和塑料桶
支起了
工地里的百合花
孤独地袅袅芬芳

出租屋一隅
在一首诗中邂逅深圳
那些唠叨家常的老乡
仿佛都是席地而坐的快乐和忧伤
有谁说出异乡人的夜晚
与故乡的炊烟有多远的距离

工地

所有的词语
都在工地码成砖头

低处（组诗）

□牧风

此刻他忘记了危险
他看见他的妻子推着满满一斗车的
沙浆 卡在了打工生活里
旁边一只震动泵 这一习以为常的事件
引起不了它丝毫的震动
男人数落着妻子的大意和不小心
女人轻泣着
月亮装着没看见
悄悄闪进了云层

声音

挖掘机在狠狠地挖掘
它的声音盖住了这一方寂静
听不见几个外地民工说话的声音
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也很单薄
被挖掘机的声音盖住了
他们弓着背忙碌着手中的活计
干脆什么也不说说了也没人听得见
夜多么的深了家乡的那盏油灯是不是

还亮着 灯下 是谁还在清理簸箕里的
豆粒 她们是否听见了飞过村子
上空的那一声雁鸣

挖掘机也有暗哑的时候
睡梦中 太阳醒来

长途客车

一辆长途客车由北向南 直穿
整个湖南 平坦的高速路面不象生活
那么的颠簸 窗外的事物我已熟悉
小村庄一闪而过
被永远地丢在了山旮旯里
车内一些陌生的面孔 偶尔的交谈之后
又陷入巨大的寂静
电视画面永远播不完的广告让人
昏昏入睡

京广线上 1800公里 一辆鄂D3691的

长途客车 每小时130公里的时速
怎么也跑不出梦中的故乡

黄旗山路

深夜的黄旗山路 静谧 安宁
几盏橘黄的路灯沉浸在漫长的回忆里
偶尔走过两三个上夜班的女工
似在漫不经心地演绎过往的故事
一辆工地上出来的汽车从布岭路切入
车上有人打起了呼哨扬了扬手中的衬衫
这条不到两公里的路 除了打工的人都
都进入了自己甜美的梦乡
两公里 从2004到2008 我走了
多少的夜路 干净的水泥路面
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平坦

汽车忽然拐了下弯颠簸着进入永顺大道
一溜烟 消逝在长长的夜幕中

深圳农民工（组诗）

□安子

愈发倦了
梅江河的水涨了退
退了又涨
仿佛梦里的呢喃

扶大的油菜花

在黎明时分
回到梅县
回到扶大
回到菜园
躺在油菜花的深处
闭上眼睛
泪水如露珠儿
在蕊蕊处盈盈地亮着

风放慢了脚步
油菜花
如一个个温暖的词语
轻舔我的思想

在黎明时分
一个女孩从异乡归来
在扶大村
一个女孩走在田埂上
如一朵油菜花

仰望春天

一个城市有一段老街

一个乡村有一段土路

一次回眸有一种抵达
一次回家有一种沧桑

一场细雨有一次收割
一场大雪有一次成长

一条短信有一种乡愁
一双翅膀有一种思念

一句乡音有一丝温暖
一张工卡有一丝希望

一滴泪水有一份痛楚
一截断指有一份呐喊

一个工位有一个梦想
一场对白有一个故事

一段恋情有一种别离
一段坎坷有一种燃烧

一札旧信有一页诗句
一本像册有一页春天

一粒沙子有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有一个天堂

开往深圳的特快列车

□袁新星

一群人站住身子，靠着车厢，咽下体内的疲惫
随台风而来的雨，把这个夏天的夜色染得漆黑

冰凉的铁轨，特快列车，摩擦出温度
大包小包行走，朝同样的方向，疾速穿过刺骨的冷气

在双脚一阵酥麻里，走过大片树木建筑的高楼
想象此刻的深圳，越来越明亮

再快些，用鞭子抽打，像耕牛的老父亲
在无限寂静的土地上，冲破黑暗的河流

给乡下的母亲写信

□贾旭磊

母亲 又到了桐花吹奏的季节
归燕打开大地的画轴
我的乡愁再次翻耕泥土

那么多的土地
母亲 我要与你们一起翻耕
一起种上芋头和花生
我要如一棵庄稼 永远守候在
你们梦之边缘
而我住在城市
辛勤于自己的工作
再也无法返回 无法
分担你们的劳累
桐花吹奏 吹奏着
孩子惭愧的心声
母亲 你要保养好那条风湿的腿
农活要悠着点干
而你手上健康的茧花 却告诉我
农人的手上没有生锈的日子

老屋

□刘显盈

二十八岁的老屋
凝结了砖瓦，粘子泥和
一大片轻飘飘的红高粱
二十八岁的老屋里
住着父母手上的老茧
弟弟妹妹们的梦
和一台八四年出厂的黑白
电视机
七十多岁的爷爷的龙头拐杖
锁不住老天坍塌的
眼泪
漏……漏……
满屋都是触目惊心的交响曲
满屋都是涩涩的叹息
正屋中堂上的一方净土
罩着一只贪玩的瘦鼠

直直落下来
撕裂
好大一一片黑洞洞的天
我躲在雨水的后面
偷窥大树紧张的表情
真的害怕一瞬间
丢失了自己
今天是老屋二十八岁的生日
只怪钱币的头发太短
没有太多给养
只好先把回忆封存起来
晒成一首怀旧的老歌
和着繁华街道上
浓重的乡音
独自斟酌

在这个城市里

□桑塔

在这个城市里
夏日的天空和我的故乡一样
阳光很毒
一群农民工的皮肤
跟呆在乡下老家务农差不多
脸庞晒的很黑

在这个城市里
这一群埋头苦干的家乡兄弟
纯朴的灵魂一不小心
就背负着一些莫名的沉重
他们把苦水咽在肚里
默默地，像家乡勤苦耕耘的黄牛

在这个城市里
披着羊皮的狼很多
注视着乡下而来的妹妹
经典情话让妹妹感动
让妹妹变成了羊
让羊一次次上狼的当

在这个城市里
乡情亲情爱情脆弱的像玻璃
一不小心都会粉碎
而那些晒的像乌鸦的家乡兄弟
还有失身一次次的羊妹妹
不停地在这个城市里赶路
真像一群没有名字的蚂蚁

我站在长安广场上

□张青松

从福永万福广场到长安广场
这是一个诗人的流浪
上午十点，我独自站在广场上
站在曾经拉着一个女孩子的手并肩站过的
灯火辉煌万头攒动的广场上
站在朱军曾经主持过演唱会的地方
站在容祖儿、李克勤、郑筠、腾格尔、斯琴格日勒曾经
唱过歌的舞台旁
我在记忆中搜寻当年的印象
而没有人知道一个诗人的回想

在我的面前
这时只不过是一个空落落的广场
一个曲终人散的广场
他们又身在何方
也许早已忘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晚上

我抬眼凝视天边
向远山顶上那高高的长安塔遥望
如同望着这一生将无法抵达的地方
我的心里茫然若失
我的脚步仍要在尘世流浪

而我还想要在某个夜晚
再次来到长安广场
也许那时的喧嚣和塔上的灯光
会把我带回到过去的时光

摄氏三十度

□门建强

滚烫、高高的脚手架上
一群人在城市的上空，穿梭
拿起微热的砖
连同生活的艰辛与疼痛
一起砌进
耸立的墙里
一面墙，起来了
昨天，被砌了进去
然而今天
却仍然躺在坚硬的砖面上
等着那双熟悉的手
将自己的生命
再次砌进冰冷的墙里
一幢楼，起来了
他们的生活
就又向前爬了一大段
然而，生命却被封进楼里
再也出不来了

多年后
城市里林立的高楼
拆了又建，建了又拆
数也数不清了
但在拆了废墟里，建起的高楼上
却怎么也找不到
他们留下的痕迹
他们也许已经死了
也许还活着，又在另一个陌生的城市
接着把未完的路，继续走完
但我相信
他们注定了
和坚硬的墙凝在一起
躺在时光的某个间隙里
不曾远去
因为那高高的墙里
也曾经孕育过
他们的梦想和希望

乡音

□孙子兵

一粒乡愁的种子，被母亲
播种在家乡低矮的屋檐
乡音的花朵，就永远开放在
我的嘴上，带着
一生一世的乡土气

远离家乡的日子
我埋藏了乡音，挖出了乡愁
操一口生硬的普通话
学做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干

□沈茂昀

没有人掏臭水沟，我们干
没有人钻下水道，我们干
没有人挖土石方，我们干
没有人进小煤窑，我们干
——我们干，我们干
为了把贫穷赶跑
为了一家人的一日三餐

我们干，我们干
这个城市跟我们离不开
苦活重活
脏活累活
我们毅然扛在肩

没有人搬重物，我们干
没有人抬泥沙，我们干
没有人送汽水，我们干
没有人清洗高楼，我们干
——我们干，我们干
风里雨里，泥里水里
我们挑战生存的极限

我们干，我们干
两脚泥污
一身臭汗
哪怕加班加点
我们没有怨言

没有人铺马路，我们干
没有人上塔架，我们干
没有人砌墙砖，我们干
没有人扫大街，我们干
——我们干，我们干
烈日下曝晒，工地上炙烤
我们忍受种种煎熬

我们干，我们干
别说我们土
别说我们脏
我们也在改造
这座城市的模样

脚手架上的父老乡亲

□向翟

我仰望的是那些在脚手架上舞动的鹰
我聆听的是那些因觅食而满是老茧的鹰爪
拨弄出的声声琴音 那只是
一些未经修饰的原始声音
质朴 浑厚 响亮
但能抵达城市的最深处

音符跳动处 城市生活在高楼里
感动的泪 不经意间漫过眉睫
我听见 大地急促的喘息声
我看见 被钢筋浇筑的骨骼
我触摸 被泥浆舔噬过的伤口
我呼吸 被汗水浸泡肉体的芬芳

旋转的麦粒 依依的小河在耳边萦绕
左手握着乡村水草的记忆 右手把着城市的触须
你们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思念故土的人
思念 凝聚成
这个城市最温暖的灯光

漂泊与失落 我生不了根也发不了芽的父老乡亲
你们是行走在城市的边缘人
羸弱的肩 沉重的铁
汗水在烈日下炉火中焚烧
赤裸的身 扭曲的脸
赤空的舞者 云端的生命
让我忧伤而幸福的注视到天明

兄弟，喝了这杯酒吧（外一首）

□贾飞

兄弟，喝了这杯酒吧
我们都来自异乡，我们都是民工
我们都在，深黑的夜晚思念家人
火车尖锐的鸣叫
常常将我们的思绪拉得太远远

兄弟，喝了这杯酒吧
我们的衣服已破旧不堪，我们的牙齿已被烟熏得灰黄
没关系，兄弟，我们对爱情已不再有奢望
那甜蜜回忆
早已像脱笼的鸟儿飞逝在远方

兄弟，喝了这杯酒吧
你在命运的乳房下劳累了一晚上，你在贫穷里心伤又彷徨
没关系，兄弟，你有强有力的脊梁
总能像葱葱的大树般，将命运的苦味——承担
将“男子汉”三个字诠释得雨水般闪亮

兄弟，喝了这杯酒吧
让一支廉价的烟缓缓燃烧到天亮
你沉默得将脸埋在阴影之中
没关系，兄弟，你妻子的病很快会就消除
而你年近的老母亲也将长寿又健康

兄弟，喝了这杯酒吧
再挑一筷子红烧肉
再添一碗岁月的米
没关系，兄弟，你还年轻，她要走走走吧
广阔的世界总能找到
另一颗心来安放你的悲苦与善良

兄弟，喝了这杯酒吧
不要再为孩子的学费而惆怅
他考上大学不正是你的期望

不要再为孩子的工作而忧伤
他那健壮的身体不正是富人的梦想

兄弟，喝了这杯酒吧
将生命的执着与忍耐品尝
我们用平凡的友情将幸福照亮
而那黎明的第一声鸟叫
将擦去我们身上的惆怅与忧伤

雪花落满了你的故乡
雪花落满了你的故乡
你在城市的高楼，将父亲头上的星空仰望
一又一个提着蛇皮口袋背着大包
浑身肮脏的年轻人，从颓废的喘着粗气的车站走出来
那眼中的惊奇与向往
正如你当年的模样

雪花落满了你的故乡
你将自己的身体寄存在狭小的地下室
这里住着
一个民工两个乞丐三个妓女
他们喝着廉价的酒水吃着平常的米饭
只是时光，无意的切割了他们的青春与梦想

雪花落满了你的故乡
你和一群孩子闲逛在城市的街头
你们的口袋里装着巧克力、面包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一对又一对搂着腰，头发光亮的成年人
他们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却让你无比惆怅

雪花落满了你的故乡
一个村庄接近死，亡一条河流将要烂掉
可是那个年近的老人母亲
却让沉重的泪水浸湿了脸庞

说说吧，大妈

□沉木

说啥？呵呵，说啥呢
俺一个扫马路的老太婆能说出啥道道
天？俺是不能给扫蓝的
河？俺也是扫不清澈的
那人心嘛？俺更是没本事给扫平的啰
不过嘛，这马路呢俺起点儿早摸点儿晚倒不成问题
吃点儿辛苦，干干净净整整洁洁那绝对没话说
看城里人走得俊俏
俺心里那个舒坦，踏实
为啥？没白拿那俩块钱嘛

什么？还要说啊？呵，真不知道说啥呢
俺一个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
能挣到这份活计，俺满意
这如今啊，只要肯苦，还是能活得蛮滋润的
你说俺有啥事儿堵心？有，还挺重的呢
每天扫到那脏兮兮的角落吃尘
总能发现一两颗被某某粗心鬼丢弃的灵魂娃，拳头般大小
又脏又臭，瞧那揪人儿的小眼神，亲爷儿一般
啧啧！可怜啊！俺心里痛得慌
就把他们塞口袋里，领回家
用清水洗洗刷刷，放到太阳底下晾晾晒晒
这不？一个个又红扑扑，粉嘟嘟，惹疼着呢
多亏了俺家那死老头子，城里城外替公司送水的时候
挨家挨户顺便着问问，赔了多少笑脸，已经送出去不少了
当然，这中间老头子肯定也挨了不少骂
有拒绝接受的，也有寻死做活的，反正花样挺多
你说气么？要说更气人的？大概是大前天吧
快凌晨五点了吧？一个也不知道是老板还是政府官员的
什么狗屁来头的胖家伙，嘿！那个油头粉面
搂着个十七八的小姑娘从酒吧里摇出来，歪歪扭扭醉熏熏的
俺好心好意捧着他跌下台阶时掉出来的灵魂娃娃追着喊：你掉魂了
——掉魂了！你猜？怎么着
他回头“砰”一声踢上车门，抡圆了就给我一巴掌
再踹上一脚，“你才掉魂呢！你才掉魂呢！”
哎——不说了——不说了
身上痛一点无所谓
咬咬牙挺挺也就过去了，可那心一直在揪着疼啊



《打工族》杂志是国内创办最早的打工类杂志，创刊十三年来，一直坚持“立足打工现实，直面打工人性，深入打工人性，引领打工时尚”的编刊思路，记录打工人身边的人和事，表现打工生涯的酸甜苦辣，强调现场感和原生态，得到了广大打工人的广泛认可，很多打工人都把《打工族》当成了自己的“娘家”。作为打工文学的主要发表平台，《打工族》杂志一直将发表优秀打工文学作品，发现优秀打工作家当成自己的责任，曾与广东省委宣传部举办过“怀抱理想、快乐打工”、“青春五月花”等大型征文，2007年还策划了《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对打工诗歌进行了全面盘点。今后，《打工族》杂志依然将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打工人的现实与梦想，记录打工人的拼搏与激情。



从“底层写作”到“打工诗歌”的批评综述

□杨清发

“打工诗歌”可以说是随着“底层”、“底层写作”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而获得批评界的关注，并成为“底层文学”最为典型的代表。虽然“底层”一词在1990年初出现在中国并进入了学术界，但是，真正成为一个个热点问题还是在2004年《天涯》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底层”及“底层的文学表述”等文章后。《天涯》杂志是最早关注关于“底层”及“底层的表述”等问题的期刊。在2004年第二期，《天涯》开辟了一个叫《底层与底层的表述》的专栏，发表了蔡翔的记叙性散文《底层》和刘旭的论文《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接着在2004年第三期，2004年第六期，2005年第一期及2005年第五期刊登对话和论文深入了这个话题的研讨。这些文章中有记叙性的文章，如蔡翔的《底层》（载于2004年第二期），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载于2004年第六期），吴志锋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载于2004年第六期）。这三篇文章都是知识分子写自己曾所处的底层。虽然作者本人已经摆脱了底层，身份也已经发生蜕变，但是，这个曾经抚育过他们的底层依然存在，并且依然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那里不仅有他们的过往，还有他们的亲人，朋友，父老乡亲。这如同蔡翔在《底层》中所发的感慨：“是的，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生活都在这里开始”。1因为在这血肉般的关联，他们所描述出的底层，是那样真切，抒发的情感不管是追忆、沉痛、或者失望与愤怒，都以一种在场的真实感打动你。他们的文章，以充满深情的叙述再现一个具像的底层，让读者对着“底层”这个抽象的术语，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

我想，只有对具体的、真实的“底层”有了了解，在面对“底层”的种种关于文学方面的讨论时，才会缩短对象与言说者的距离，才不会把“底层”、“底层写作”当成一个抽象的术语，仅仅当作一个话题来讨论。正是有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注，才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底层写作”的思考与研讨。这使得“底层”从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慢慢转化成一个文学上的问题。最初关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的文章有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载于2004年第二期《天涯》）、刘继明《我们怎样表述底层？》（载于2005年第一期《天涯》）、蔡翔与刘旭的对话《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载于2004年第三期《天涯》）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作家关注的焦点是“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底层处于表述之中”、“底层经验的文学表示”、“底层在如何被表述”、“底层在文学表述中被扭曲”等论点。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主要是对“底层”能否具有自己话语权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关于底层，学术界无不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底层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很少占有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他们是弱势群体，是需要帮助的对象。是的，沉默，没有话语权，文学表述中的他者正是底层的特征。接着作者提出：“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2或许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只有听到底层自己的声音，我们才可能认识到真正的底层，而其它对底层的表述者也就没有权力再去扭曲底层了。只是，他如此表述无意与开头所提出的论点相矛盾，底层被称为底层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沉默的，如果他们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便也就从底层摆脱了。在此对作者的两个观点作出反驳，只是想证明自己的观点：目前要让底层拥有发言权，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唤起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是不可能的。惟有有了对底层足够的表述，底层才可能获得关注，社会的正义与良知才可能被唤醒，底层的状况才可能被改善。所以，知识分子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说话，底层的文学表示是具有意义，也是极其重要的。

正是《天涯》上面一系列关于底层表述的文章，引发了文学界对底层文学的关注。此后不久，《上海文学》、《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山花》、《新华文摘》等杂志发表了讨论“底层写作”的文章。在这些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中，“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无疑成了作家讨论的重点，或者是拿来佐证观点的对象。通观批评界对“打工诗歌”总体批评状况，可以发现至今存在两种意见相左的两方。一方是因为它关注生活现场，底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具有现实精神与人文精神而极力支持，在这一方中又有两种类型，一种认为强调现实关怀与诗歌的写作伦理也不能牺牲诗歌的艺术性，如张清华、吴思敬、王光明，但有论者认为其粗糙的诗歌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缺陷也是可以原谅的：“而他们为了自己的‘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牺牲了一些‘美学技巧’也就可以得到文学的原谅了”。3“我认为打工诗歌在语言技术上不应过多注重”4。另一方则认为“打工诗歌”是非常幼稚与粗糙的，它之所以获得关注，并不是因为它自身的艺术成就，而是依靠伸张诗歌伦理，底层的道德关怀等诗歌之外的因素来获得高于它本身艺术价值的声誉。对“打工诗

歌”抱警惕态度的以老刀，钱文亮等人代表。总体看来，特支持态度的还是占了主流。

2005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底层写作”特别是“打工诗歌”进行了论述。在《视点》这一栏中，孟繁华用了“文学第三世界”这个类似政治术语的比喻来形容当下的“底层写作”，无疑形象地揭露了这一写作领域所处的弱势境遇，作者认为当前批评界对这个领域的写作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当然，这一写作在一个消费时代曾被淹没，然后，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底层这一术语的提出才出现，这一文学写作还是开始了复兴。作者用了“第三世界文学”的“再度崛起”说明了底层文学写作引起关注，受到重视这一现象。《文艺争鸣》在这一期就开辟专栏“在生存中写作”对“打工诗歌”等“底层写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讨。这个专栏刊登了张未民的《关于“在生存中写作”》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柳冬妩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这个专栏的文章可以说都是对“打工诗歌”等“底层写作”特支持态度。几位作者以自己的视觉言说了对“打工诗歌”的看法。张未民在《关于“在生存中写作”》将“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等生存在前沿者的写作称之为了“在生存中写作”。这一命名当然是相对于文坛中存在的那些“在写作中生存”的职业性作家的文学。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强调了这是‘在生存中’的‘写作’，强调了‘生存’对于这类创作实际的生活意义和实在的文学意义，强调了一个在生存现场打拼的‘生存者’所能带给文学的全部奉献和局限，这种文学才会区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坛的常规写作方式，所谓‘作家’的写作方式，我们才得以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打量一个更大的文学或文坛的整体性存在。”5本文作者极力支持这种新的文学写作。他认为这种写作是给我们带来我们与平时习以为常的“文学”不同的新的文学。在通过对“在生存中写作”与“在写作中生存”两种写作方式的比较，作者概括出前者具有表现生活的真实性、确切性与所充满的现实主义正是后者所欠缺的。本文作者无疑对当前主流写作与现实的隔膜与一些作品所表现出的审美精神幻觉是不满的。他由此归纳出“在生存中写作”的价值所在：“面对‘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现象，我们以为它像一面镜子立在了这个主流文坛的面前，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种种新的激活与思考，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6面对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作者没有排斥，没有忽略，而是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与支持，这重态度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在对两种文学写作的比较中，作者对“在写作中生存”的批判与对“在生存中写作”的赞扬未免片面了。在我看来，“在写作中生存”与“在生存中写作”只是两种不同的写作向度，各有其优缺点。它们也不是完全二元对立的。不能因为“在写作中生存”的美学追求就全盘否定了他们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性。现实性也是多样的，并非只有那种粗硬的、艰辛的生存现实才叫现实，也并非只有关注平民、关注苦难的作品才叫关心现实，也并非日常性的、现实、直接性的表达才叫具有现实精神。而且，我也不认为具有了写作上的伦理优势就可以忽略掉他们艺术上的缺陷，作者说：“而他们为了自己的‘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牺牲一些‘美学技巧’也就可以得到文学的原谅了”。7在我看来，运用“美学技巧”与表现“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并不相冲突。要表现“现实精神”并不是以牺牲“美学技巧”为前提。相反，熟练的诗歌技巧可以更好的去表现“现实精神”。目前，“打工诗歌”普遍存在诗歌语言直白，缺乏诗意，诗歌技巧的欠缺等不足，应该说是他们作品缺乏了“美学技巧”而非牺牲了这种艺术技巧。论者发是也注意到了“打工”诗歌的这一缺陷，他认为“现在打工诗人缺乏理论的导向。肤浅的摹写结果导致大面积语言与题材的重复”。8但他却主张：“我认为打工诗歌在语言技术上不应该过多注重，但必须要不断翻新。”9我想，“打工诗歌”受到关注，跟我们的时代境遇有关，它确实如有些论者说的那样，受到关注更多是其它原因，而不是诗歌自身的成绩。所以，如果它不在诗歌的艺术性方面提高自己，那么，它很可能在时过境迁中被淹没掉，因为，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经得起时间的淘汰。看到“打工诗歌”的优点，对它特支持态度的还有吴思敬、王光明、张清华，徐敬亚等评论家。在几位作者的论文中，与张未民的论文观点差不多，都是将当前文坛脱离现实，写作内倾化，沉溺于纯粹的诗歌技术、美学追求的写作现象作为影现“打工诗歌”关注现实、底层的时代伦理的一个对生物，或者说反面的材料。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载于2006年第五期《南方文坛》）与王光明的《近年来的诗歌的民生关怀》（载于2007第六期《新华文摘》）连命名都体现出一种共同的认同倾向。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1、从社会原因与新诗自身发展的因素这两个层面来分析底层诗歌写作渐成声势的缘由。2、通过对批评家

关于底层诗歌写作的两种相反的观点的引述与评价，表明自己对底层诗歌写作的赞同。3、底层诗歌写作由谁表述的问题。作者认为，非底层出身的诗人，站在了最基本的人性立场与道德立场，诗歌的内在素质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那么，这些诗人一样能真实地表达出底层，而来自底层自身的写作，则让底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4、在文章最后，作者强调不能“题材决定论”，诗歌应该遵循诗的美学原则。这篇文章，诗人仅仅从这个诗歌现象入手，从比较大的方面论述了底层诗歌写作是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和它的价值。王光明的《近年来的诗歌的民生关怀》提出与总结了底层诗歌写作出现的种种原因与让人思考的各种角度和对这个文学现象关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作者认为应该将主要精力放于“底层”写作这一现象，分析它的性质与特点，而不应该将讨论重点放于争论这类作品是“代言”还是“自言”，是“社会承担”还是“艺术探索”这些问题上。作者高度赞扬“打工诗歌”等“底层写作”诗歌，认为这类诗歌具有现实与艺术的双重意义。因“打工诗歌”所具有的时代意义、社会责任感而肯定它，还有张清华，徐敬亚等。虽然他们都强调不能因为强调诗歌的写作伦理而忽略它的艺术要求，无疑，他们都因这种题材的诗歌的伦理优势而肯定了它。“我本不想说，有了打工诗歌”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了，无论是现实还是诗歌都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伦理问题的浮现而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确信它给我们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也因此给当代诗人的社会良知与‘知识分子性’的幸存提供了一丝佐证。在这一点上，说他们延续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也许并不为过。”10哪怕他们的诗歌水平十分幼稚。但正是他们，让我们的情感不安，让他们在和平、富裕、百无聊赖的生活看见了历史前方曾经出现过的一切因人群分化产生的异变”11他们的态度无疑是客观的、公正的，也是开放和包容的。

但是面对同一写作现象，一些论者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诗人的写作只应该遵循‘诗歌伦理’来进行，应该遵循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所具有的艺术伦理要求，遵循诗歌写作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所具有的艺术伦理要求，遵循诗歌写作特殊的专业性质，特别是诗歌言说方式的特殊性质所要求的基本法则。没有这种来自艺术本身要求的诗歌伦理意识，诗人很容易在流行的道德观念和时髦的公共性说法中迷失自己，最终导致的反而是诗歌对民族、人类精神解放与文化创造这一长远价值贡献的丧失。”12如果说钱文亮所要表达的害怕只强调诗歌的社会伦理和道德，会导致在一种简单的题材决定论中使诗歌屈服于载道论和工具论。那么，另外一些论者则表达了更鲜明的反对：“打工诗歌作为近几年备受关注的的一个词条，正在获得远高于它本身艺术价值的声誉”、“作为诗歌评论者，首先应该坚持客观的艺术标准和基本的良知，不能因为打工者生活艰辛出于同情而给予其作品不恰当的评价。”13在老刀看来，不管从诗歌艺术还是现实意义角度来看，“打工诗歌”的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它关注底层苦难，也过度渲染与夸大了这种苦难，就显得矫情、夸张、刻意虚张声势。而当前一些评论家对“打工诗歌”的过度支持也就变成了吹捧。载于2006年第五期《南方文坛》的一篇文章《“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便批判了当前对“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的大肆提倡。本文作者认为目前过分强调“底层写作”和“诗歌伦理”的现象显得有太多跟风炒作的嫌疑。她在引用了刘旭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关于任何表述对底层来说都是一种扭曲，都是无意义的那一段话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见，不少诗人和评论家是把‘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这些强烈的伦理诉求仅仅当着蛊惑人心的文学口号在使用，其目的无外乎通过标榜自己的伦理优越感，抢占新发现的诗歌领域的制高点，谋求在文学界和文化界的话语霸权，因此，这种诗歌伦理必然是一种伪诗歌伦理观。”这样得出结论未免显得太过牵强和武断。作者所引用的引言就未必能站得住脚，而她用来必须成立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论据，得出结论的有效性当然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为什么“打工诗歌”等“底层写作”在世纪初出现后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而首先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引起关注的一个很大因素在于它写作伦理上的优势。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写作是诗坛上不曾有过的，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东西。要评价一种文学现象，艺术性并不是唯一的标尺。当年“湖畔诗社”几位诗人的诗歌又有多高的艺术造诣，那为什么它又被写进了文学史呢？就是因为它给当时诗坛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而文学是需要不断的渗入新的元素来激活的。我认为，“打工诗歌”的文学意义与价值也在于此。所以，它会受到关注，引起争议。如果仅仅关注“打工诗歌”等“底层写作”就被扣一项“沽名钓誉”的大帽子，我想每个真诚关注底层的人都不愿接受，也要怀疑本文作者的想法是否太阴暗了一些。

不管是特支持态度的论者还是表示否定的论者，在论述时面对诗歌“语言”、“艺术”

与“题材”、“现实”时，都难免在提倡一方面而贬低另一方。将二者对立起来。甚至犯矫枉过正的毛病。那么，该如何对待诗歌语言、技巧与现实、题材这两方面呢？王永的《“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给了我最为满意的答案，这是一篇很成功的论文。是目前我所看到的相关论文中最为优秀的一篇，作者的态度是公正、认真与严肃的。不捧杀或者棒杀之嫌，分析深邃、切中要害，不仅有事例，也有相关的理论支撑。文章首先提出近年来关于“打工诗歌”，评论界所出现的“伦理与诗歌伦理”之辩这一现象，引述出正反两方的见解：“有些评论者指出，‘打工诗歌’是一种‘生存中写作’，更具‘现实精神’、‘民间因素’。这种建立在‘我手写我口’式的内在基础上的写作，是对‘技术主义’的反驳，也‘勇敢地表现出道德上的勇气’，并彰显了‘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针对于这些评论，钱文亮认为，这只是‘诗歌界人士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矛盾与思想文化分歧的顺势选择’，并动用了‘来自诗歌之外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公共性概念’，因此提出，认为诗歌应遵循其自身的写作伦理法则，即‘一种审美的角度，一种沉着的专业的态度’，通过‘技巧’和诗歌形式，成就‘能够保持苦难的重要与质感的、具体的诗歌文本’”14对这两种意见，作者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作者并不赞成钱文亮的观点，钱认为“以二极对立的方式，通过对诗歌技术主义倾向的伦理化贬低，来伸张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的价值优越性”15作者认为当前论者力挺“打工诗歌”，贬抑诗歌技术主义，批判文化精英主义是一种“文学的祛魅”。他认为“生存中写作”是“90年代诗歌”介入精神的延续，并且引用了希尼《诗歌的纠正》中的相关理论，论述了诗歌介入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是诗歌的正当职责。但他并不像有些论者那样犯矫枉过正的通病，认为关注底层，具有了现实精神就可以牺牲诗歌技巧和审美原则。相反，他认为诗歌的价值，应该体现在诗歌对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的‘如何介入’。作者在这里强调了个体主体性的重要性和语言对诗歌的本质价值，语言之于诗歌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诗歌永远在其语言空间内有力地保护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

正是显示政治和其它文化制度的最终目的。”16，“诗歌的形式、技巧只有在和藏朴所说的‘不断向存在敞开的特殊的感受力’相结合并构成一种互动关系时，才能保证诗歌自身的‘话语’能力”。17如果我们领悟了这个观点，就不会对当前出现的“打工诗歌”先验性的进行否定，也不会支持“打工诗歌”批判“诗歌技术主义”而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像这样客观与全面的看待这个问题，还有冯雷。他在《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所提出的观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从两个大的层面即“经验世界的‘介入’问题”，“作为现象对语言的减负”展开了对诗歌“底层经验”写作的论述，在他看来“在象征与符号二者之间任何角度的偏向都会造成文类的萎缩。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怎样以诗歌的形式建构的物质性，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形式探索的向度，有效接纳、整合公共空间。使象征与符号之间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18他认为“底层经验”的受到关注并不是立足于诗歌自身的成就，因为语言的平淡、寡淡正是“底层经验”的诗歌面临的困境之一。他认为“诗歌要表达社会关怀，要接近客观对象，需要对语言减负，可并不是要语言退化。”19这样的提醒不无道理，对“底层经验”的诗歌写作也意义重大。惟有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诗歌，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唯有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诗歌，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只有不断锤炼语言、提高技巧，“底层经验”的底层写作才会在时过境迁中被淘汰。虽然对“打工诗歌”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声势，但就目前状况看，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依然不够深入。总体看来，这些讨论大多数都是从这个现象或者这种写作所体现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等诗歌之外的层面作为论述的切入点，多数研究停留在它出现的时代背景，诗坛背景与“诗歌伦理关系”，它的时代意义等方面，而很少有从诗歌文本出发，来分析“打工诗歌”，它的主、思想重要是什么，它有哪些优点与不足，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怎么不同的感受，它具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意义。我想，惟有从文本出发，通过细读发掘“打工诗歌”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色，才有根据去评说它的优点与不足，才有权力去总结它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

- 1 蔡翔《底层》，载《天涯》2004年第2期。
- 2 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载《天涯》2004年第2期。
- 3 张未民《关于“在底层中写作”》，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 4 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461页。
- 5 张未民《关于“在底层中写作”》，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 6 张未民《关于“在底层中写作”》，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 7 张未民《关于“在底层中写作”》，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 8 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461页。
- 9 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461页。
- 10 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 11 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468页。
- 12 钱文亮《伦理诗歌与诗歌伦理》，载《新诗评论》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13 老刀《直面苦难还是直接抒情？》载于《新京报》。
- 14 王永《“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 15 王永《“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 16 王永《“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 17 王永《“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 18 冯雷《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 19 冯雷《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征订及邮购启事

一、事由：

本书近期已基本选编完毕，收录了全国各地近百名打工诗歌作者的优秀诗歌作品，同时也收录了一些打工诗歌评论。本书是对2008年全国范围内打工诗歌的一次整体扫描，对于研究打工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打工诗歌写作者提供了一个写作的文本。收藏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定价：

每本30元（免邮费）。

三、出版时间：

本书将于2009年2月左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由于数量有限，确实需要者，可提前邮购，以保证能够订到本书。书出后，我们会准时邮寄给你。

四、邮购说明：

请通过邮局邮寄或信封夹寄。请写清邮购数量。请提供本人手机及邮箱，以便联系。凡邮购者，将长期收到《打工诗人》的免费赠报。

五、邮购地址：

215101苏州市木渎镇香榭假日山庄5-502信箱 许强
联系邮箱：手机：15995751289

《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编委会
2008年11月